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博士文库



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

——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



SHENTAI CHONGJIAN
DE WENHUA LUOJI

付广华 著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博士文库



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

——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

SHENGTAI CHONGJIAN
DE WENHUA LUOJI

付广华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付广华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6

ISBN 978 - 7 - 5660 - 0369 - 0

I. ①生… II. ①付… III. ①人类环境—研究—龙胜县
IV. ①X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5715 号

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

——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

著 者 付广华

责任编辑 满福玺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8472815（发行部）

传 真：68933757（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8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369 - 0

定 价 28.00 元

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白振声

副主任：丁 宏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仁 祁庆富 吴楚克 张国杰 张海洋 李 丽

杨筑慧 苏发祥 邵献书 徐万邦 黄有福

序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是创新能力。虽然不是每个博士都能具备这种素质和激情，但如何使他们向这个目标靠近，则是博士生教育所应担当的责任。1998年5月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是中国高校，特别是被列入“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所努力探索的目标。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属于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心成立后，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相互促进的方针，不断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博士文库”就是我们为此而搭建的一个学术平台。本中心在“985工程”二期建设过程中先后吸收了150余人参与调研工作，其中一半以上是相关专业的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的参与既保证了这支队伍的专业化和年轻化，有利于成果的创新，同时在科研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素质和研究能力。他们所撰写的成果多是对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这正是我们中心的学术定位，即为解决边疆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问题提供借鉴和理论支持。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我们将继续下去，并力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在今天这个以经济发展和技术竞争为主题的时代，急功近利

和功利主义的观念常常使社会科学与人文精神受到忽视。但一些青年博士能够不随波逐流，不赶浪头，致力于被视为“冷门”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毅力、智慧、社会使命感和创新精神。发表他们的作品，也是对“人文精神”的彰显。

民族学人类学倡导人类不同群体之间要宽容、尊重、公正、理解，这个主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好的，最优秀的。这既是一种天生的感情，也是一种偏见。当今弥漫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歧视甚至争斗，正是源于这种偏见。偏见往往是由于隔阂造成的，而民族学人类学就是要打破这种隔阂。它主张这样的道理，就是人类文化虽然形式各异，但都是各民族适应特殊环境而形成并发展的，都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实际价值，因而人们对文化的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不同民族之间，对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应该互相尊重、相互理解、取长补短。要求文化与文化间，民族与民族间，也包括人与人之间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不仅要保持本民族的、自己的美，也要懂得欣赏、学习他人的、他民族的美，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从这个角度讲，民族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类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国在校博士生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然而我们所追求的不该只是数量，更需要质量的提升。为博士生提供创新能力自由发展空间的平台，鼓励他们在实践中独立思考，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有创造力的分析和思考，就是这套“博士文库”的目标。

当然，创新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创新中出现的幼稚和缺陷都在所难免。希望我们年轻的博士们不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更加成熟的高度攀升。

丁 宏

2009 年 2 月 26 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研究综述	(5)
三、理论视野与关键概念	(19)
四、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概况	(34)
五、田野点的自然与人文图像	(39)
第二章 景观的变迁:生态重建的历史场景	(50)
一、从山林到农田:农业开发的消极影响	(51)
二、从均衡到退化:政策失误的生态恶果	(64)
三、从退化到修复:自上而下的生态重建	(80)
四、在历史场景中认知生态变迁	(88)
第三章 “绿色”的权力:生态重建的国家支持	(91)
一、作为“绿色”权力表达的生态重建	(92)
二、沼气推广工程与生态重建	(102)
三、退耕还林工程与生态重建	(115)
四、反思国家权力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127)
第四章 科学与民族科学:生态重建的知识体系	(131)
一、参与生态重建的两种知识体系	(131)
二、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重建	(149)
三、现代科学技术与生态重建	(163)
四、生态建设必须综合运用两种知识	(175)
第五章 全球性联系:生态重建的外部力量	(178)
一、在地方生态重建中发现全球性	(178)

二、系统外部输入与生态重建	(186)
三、村民外出务工与生态重建	(197)
四、把握地方与全球的多样联系	(205)
第六章 结语:不确定的未来	(209)
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39)

图表目录

图 1-1 龙脊十三寨地理位置示意图	(47)
图 2-1 廖姓先祖廖斋碑文拓片	(53)
图 2-2 平段寨所藏民国十九年潘姓宗支部抄本	(56)
图 2-3 载有棚民之事的廖姓宗支部	(59)
图 2-4 1958 年龙胜放木材卫星实况	(66)
图 2-5 龙脊村 1991—1993 年造、封规划表	(82)
图 2-6 龙脊村民的省柴灶施工证	(83)
图 3-1 龙脊古壮寨干栏中的沼气池	(105)
图 3-2 龙脊沼气建设先进村的奖状	(109)
图 3-3 龙脊古壮寨流行的沼气灶	(111)
图 3-4 退耕后种植的毛竹林	(124)
图 3-5 退耕后种植的杉树苗	(126)
图 4-1 廖家寨的龙泉亭	(151)
图 4-2 平段寨旁的古樟树	(152)
图 4-3 雕刻有青蛙和螃蟹的太平清缸	(154)
图 4-4 龙脊村民用来分水的“水平”	(158)
图 4-5 道光二十九年龙脊乡规碑	(163)
图 4-6 林业部门下发的毛竹低改技术资料	(167)

图 5 - 1 龙脊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结构图	(185)
图 5 - 2 外出采购食品的古壮寨民众	(189)
图 5 - 3 房东家的液化石油气设备	(193)
图 5 - 4 遍布卫星电视接收器的古壮寨	(196)
图 5 - 5 外出务工对生态重建的积极效应示意图	(204)
表 2 - 1 龙脊古壮寨 1991 年耕地及计划开发面积 统计表	(73)
表 2 - 2 龙脊古壮寨六组 1985 年受旱灾面积产量 调查表	(78)
表 2 - 3 龙脊古壮寨 1988 年植树造林数目表	(81)
表 3 - 1 中央财政 2003—2011 年支持广西农村 沼气建设资金统计表	(102)
表 3 - 2 龙脊古壮寨 2000—2001 年沼气池建造数目 统计表	(108)
表 3 - 3 龙脊古壮寨第四组 2002 年退耕还林 统计表	(120)
表 3 - 4 龙脊古壮寨第五组 2002 年退耕还林 统计表	(121)
表 4 - 1 龙脊古壮寨 1991 年粮食作物种植情况 统计表	(171)
表 4 - 2 龙脊古壮寨 1991 年再生稻、垄稻种植 情况统计表	(173)

第一章 絮 论

一、研究缘起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史密斯（Sheldon Smith）提出，当今世界处在“失序”的时代。举凡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延伸到环境领域，都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轨道，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危机和困境，是一种迫切需要扭转的“失序”状态。^① 人类学家面对这种状态，并不可能无动于衷。时任美国人类学联合会主席的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认为，所谓的“失序”状态可称之为“非适应”，它不仅表明了结构的失序会在本质上生发麻烦，而且还会阻碍社会系统适应性反应的能力。然而，适应性的反应是可以纠正或改善系统所处的麻烦境况的。为此，拉帕波特提出了所谓的“关于麻烦的人类学”^②，引领了应用人类学和环境人类学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失序”问题中，生态环境危机无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美国人类学家约翰·博德利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发展问题：环境危机、自然

^① Sheldon Smith. *World in Disorder*, 1994—1995: an anthropolog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global issue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1995, pp. 1—3.

^② Roy Rappaport. Distinguished Lecture in General Anthropology: The Anthropology of Troubl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3, Vol. 95, No. 2, pp. 295—303.

资源、食品体系、人口问题等，都内在地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①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平衡，因此历来面临着强大的生态环境压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政策和发展战略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又由于采取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无形中忽视了环境代价，使得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不仅长期郁积而发的沙漠化、石漠化难以治理，而且不少区域小生境森林覆盖率下降、水土流失严重，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这种难以为继的恶劣境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适时采取封山育林、沼气推广、退耕（牧）还林（草）等一些适应性政策，试图扭转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幸的是，经过 20 多年的生态恢复与重建，中国西部某些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山清水秀，石山变绿，森林覆盖率和蓄积率得到很大提高。为对中国的生态重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本书选择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古壮寨为田野点进行个案研究。

龙脊古壮寨坐落在南岭之一的越城岭的余脉之上，是南岭走廊民族研究的重要一环。南岭，又称“五岭”，包括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作为中国南部最具地理意义的山地，南岭是我国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分界线，是华中和华南的自然与农业生产差异的重要界线。费孝通先生历来重视南岭民族研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就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大瑶山进行调查。新中国成立后，费老还率领民族访问团到越城岭一侧的龙胜各族自治县进行慰问，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后来写了

^① [美] 约翰·博德利著，周云水等译：《人类学与当今年人类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一文。^① 20世纪80年代，费老在阐述其“民族走廊”学说时，曾四次提及“南岭走廊”。1986年5月，费老在香港召开的“第一次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曾指出：“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研究好了，不仅有助于上述各族（指瑶族、壮族、汉族等）历史的研究，而且也可以大大丰富中国通史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各民族情况的深刻了解。”^②由此足见南岭民族研究的重要地位。

就龙脊古壮寨本身来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曾经在此进行过较为细致的调查，不仅收集了众多历史文献资料，而且还形成了专门的研究报告，为后人的追踪调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比对资料。2006年至2008年间，笔者曾因课题研究和硕士论文撰写需要，先后5次到龙脊壮族、瑶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耳濡目染之间，了解到该地区曾遭受严重的生态破坏，导致地方性生态系统发生退化，甚至给当地带来严重的旱涝灾害。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一系列生态重建政策的实施，龙脊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逐渐好转，良好的生态系统逐渐恢复，稻作农业生产连年稳定，成为南岭地区生态重建的典型代表之一。作为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民族学工作者，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对这一生态环境变迁的历程予以关注，找出其中影响生态退化和生态重建的制约性因素，为南岭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现实的借鉴和参考。

其实，在本项研究开题之初，笔者仅仅欲从沼气推广的角度入手，探讨该工程、生态与话语体系。随着思考的深入，笔者逐

^① 费孝通：《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2—87页。

^② 费孝通：《瑶山调查五十年》，《费孝通文集》第十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渐发现，不论是沼气推广也好，还是退耕还林也罢，都是国家试图恢复和重建区域生态系统的一种工程性举措，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与此同时，在完成所主持的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课题的过程中，笔者进一步接触到了武鸣县、忻城县、德保县的沼气推广、石漠化治理以及稀有物种保护等生态建设实践，对生态恢复与重建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最终，笔者把研究主题定位为“龙脊古壮寨的生态重建”。可能有人会说，生态恢复与重建是自然科学家的专门话题，社会科学不必要涉足该方面的研究。其实，生态恢复和重建，本质上也是一种人类行为。只要是人类行为，就必然受到生态之外的政治、科学以及文化习惯的约束和影响。环境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中专门研讨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分支学科，完全有必要和有能力介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从中发现制约生态修复和重建效果的因素，从而为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提供可行性路径和理论上的深入解读。

本项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和现实两大方面。具体来说，理论意义又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从选题上来说，生态重建作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举措，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关注较少。人类学是经世致用的学科，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介入这一问题，通过应用其独特的文化工具和研究视角，把生态重建放在区域历史场景和政治经济格局中进行衡量，可以彰显地方工程的全球性意义。二是从理论指导上来说，环境人类学是新兴的学科领域，在中国还很不发达。通过对龙脊古壮寨生态变迁历程的环境人类学分析，不仅可以反思政策、权力在生态变迁中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中潜在的传统生态知识因素，为环境人类学理论提供一个研究案例。三是从壮学发展着眼，作为综合性的研究壮族的学科，壮学如今已是蓬勃发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生态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壮族乡村生态变迁的研究

更是难得一见。^①故本项研究能够弥补壮学生态研究的不足，为全面认识壮族文化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当然，本项研究还具有一些现实意义：生态变迁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常态，如何认识变迁的原因，把握变迁的力度，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局势，是西部民族地区政界、学界和民间始终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通过对龙脊古壮寨生态退化与重建历程的分析，探讨国家权力、传统知识、全球性联系等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壮族地区的生态现实，而且还有利于彰显生态重建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为推进沼气推广、退耕还林等生态重建决策提供案例支撑，为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

二、研究综述

（一）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梳理

1. 国外研究进展

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生态重建由来已久。人类诞生以后，在利用火的基础上，发展了依赖森林自然恢复的游耕农业，颇具修复性土地管理的意味。当然，这些重建活动基本上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试图恢复的只是再次获得食物的能力。19世纪末，一些天才管理者才在分散的地点试图重建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30年代，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发起了许多大型的生态重建项目，目标直指构建整体的生态系统，最终引导学术界走向了“生

^① 少量的例外，如覃彩銮的《论壮族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学术论坛》2000年第6期）、付广华的《关于开展壮学生态研究的设想》（《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气候灾变与乡土应对：龙脊壮族的传统生态知识》（《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等论述。

态中心的重建”。^①

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重建开始成为应用生态学的研究主题，不少学者或机构开始参与到该主题的研究中来。1980年，恢复生态学的奠基人布拉德绍（A. D. Bradshaw）等人提出：生态重建作为一个总括性的术语，被用以描述所有那些寻求提升受破坏的土地或再造已被破坏的土地并且使其生物潜能得到恢复的活动。^② 1987年，生态学家乔登三世（William R. Jordan III）等人出版了名为《恢复生态学》的著作，成为向生态学界之外的学者传递生态重建研究最新成果的代表性作品。^③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生态重建的研究逐渐走向繁荣。不仅每年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出版，而且还把该项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界，成为哲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在研究和探讨生态重建实践的过程中，一些自然科学出身的学者开始发现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加拿大学者黑格斯（Eric Higgs）早期从技术修复的角度对生态重建进行研究，后来逐渐把学术兴趣点转移到技术变迁与当代文化的关系上，并最终接受了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方法。由于对人类学有着深深的挚爱，这一时期的黑格斯加盟了艾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写作发表了几篇颇有人类学色彩的学术论文。黑格斯认为，如何科学地界定“重建”是学术界难以回避的重

^① William R. Jordan III, George M. Lubick. *Making Nature Whole: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ashington D. C. : Island Press, 2011, pp. 1 – 5.

^② Anthony D. Bradshaw and Michael J. Chadwick. *The Restoration of Land: The Ecology and Reclamation of Derelict and Degraded Land*.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2 – 3.

^③ William R. Jordan III, Michael E. Gilpin, John D. Aber. *Restoration Ecology: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Ecological Rese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大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技术上的事情，更涉及伦理上的事项。与西方科学培训出来的重建主义者不同，黑格斯认为好的生态重建要把眼界放宽到包括历史、社会、文化、政治、艺术和道德在内的所有方面。如此一来，这个包罗一切的重建过程不仅能够实现生态保真，而且会实现生态系统中人类关系的和谐。^① 后来，在回顾其生态重建研究所受其他学科的影响时，黑格斯如此表述：“哲学家倾向于一般化和普遍的理论，而人类学家关注描述和特殊的观察。当我努力经由这些相反的优点去探寻世界和重建的意义时，它们之间的共生互存显露无遗。哲学给了我勇气去确认构成重建的模式，并引领我远离概念和实践的浅滩。人类学使我更加理解人们如何解释的倾向，而且使我能够触及重建之下的文化表达的多样性、特性的重要以及帝国主义风险。”^② 面对生态重建潜在的全球同一实践，黑格斯进一步反思：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从他者自身的视角去解释他们所相信的。如美国式重建理论依赖的是尖端的技术、实践者的经验和科学的知识。一旦脱离了具体的法律和习俗的文化背景，这些都可能会搁浅。^③ 因此，黑格斯倡导，要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不足，摒弃其道德中心主义地位，向其他种类的各种地方性知识敞开怀抱。只有实现了科学生态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有机融合，才能够推动生态重建的实践不断走向前进。^④ 对于这一点，美国人类学

① Eric Higgs. What is Goo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onservation Biology*, 1997 (2): 338 – 348.

② Eric Higgs. *Nature by Design: People, Natural Proces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3, p8.

③ Eric Higgs. *Nature by Design: People, Natural Proces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3, pp. 8 – 9.

④ Eric Higgs. The Two – Culture Problem: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Restoration ecology*, 2005 (1): 159 – 164.